

## 第六章 結論

清代學術，與先秦諸子學、兩漢經學、魏晉玄學、隋唐佛學、宋明理學在中國學術史上卓然並稱，足見其在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。儒學發展到清代，可謂綜整前代，蓄積甚廣，但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，清代學術較少被關注其儒學發展的流變。清代學者頗具歷史意識，以及學術定位的觀點，於此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及《宋學淵源記》明顯表現出清儒思考本身學術定位的問題，嘗試建構清代儒學的學術架構尤為顯著，本文即以此為方向，在清代學術中，了解漢學與宋學雙軌並行，完成清代學術的歷史定位，建構出清代儒學完整的系譜架構，展現出清代儒學學術更為全面具體之脈絡思惟。

然而江藩何以為清代儒者著書立言，顯然是為了繼惠、戴昌明漢學之功，通過為清代漢學家立傳，達到重振漢學的目的，這是江藩編纂《漢學師承記》的真正意圖，也是惠派尊漢信古的治學宗旨，得以在學術史方面具體的展現。然在「尊服鄭」、「法程朱」吳門師說的主張基礎下，兼采漢、宋，折衷「服鄭」和「程朱」的學術主張，不難理解江藩所說的「為是《記》，實本師說」的含義，其旨在貫徹惠氏之說。因此，江藩編纂《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乃承其師說，以備採擇，兩者相佐，正可呈現清儒更全面之學術樣態。

本文論述的主軸，以江藩撰著《漢學師承記》及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為中心，以學術史觀點，循著學術流變的線索，切入清代學者宗主漢學與宋學的背景，以釐清其中二者之內涵，藉以提供理解清代經學發展的環節，有系統地建立起清代儒學系譜。再者以清儒本身的學術觀察為軸線，藉由系譜觀點，了解清儒傳承世系之關係，凸顯每一位經師之地位，及其師承與影響，最後呈現清代儒學學術之具體脈絡，展現清代學術之歷史定位。

欲考察清代學術之歷史定位，應將其和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作聯繫，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最鼎盛的時期，又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走向近代社會發展的轉捩點，因此學術發展更形多元、豐富。清廷制定「表彰經學，尊重儒先」的文化政策，以及編纂圖書與整理典籍的工作，皆有助於提升學術發展之氛圍，及維繫文化傳統的作用。故江藩之著作，有保留清世學術真實面貌之用意，清儒之努力，自有其傳承，有其彰顯，而諸儒之成就可蔚為一代之學術成就。

從江藩二書中，可觀察江藩學術之師承，與時人交遊之情形，江藩常藉由直接觀察作為第一手資料，因此能深刻道出傳主人物之學術樣態，或藉由間接觀察

論其人格風範，足見材料之豐富。然而探究江藩著書之真正目的在於為書中傳主人物，確立其歷史定位，尤其特別收錄遺落草澤、踏實治學而沒沒無聞的學者，此類學者大多無事功可供後人瞻仰，然其一味鑽求學問，於學術成就上不容掩沒，故江藩自己在《漢學師承記》論到：

嗟乎！三代之時，弼諧庶績，必舉德於鴻儒；魏晉以後，左右家邦，咸取才於科目。經明行修之士，命偶時來，得策名廊廟；若數乖運舛，縱學窮書圃，思極人文，未有不委棄草澤，終老丘園也。甚至饑寒切體，毒螫瘡膚，筮仕無門，齎恨入冥，雖千載以下，哀其不遇，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！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，山林則兼志高風。非任情軒輊，肆志抑揚，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，候草木以同彫也！<sup>1</sup>

他在編纂《宋學淵源記》時也談到，朝廷顯宦如湯斌、魏象樞、李光地、熊賜履、張伯行等人不具錄，對於自己記載的對象，曰：

國朝儒林代不乏人，如湯文正、魏果敏、李文貞、熊文端、張清恪、朱文端、楊文定、孫文定、蔡文勤、雷副憲、陳文恭、王文端，或登臺輔，或居卿貳，以大儒為名臣，其政術之施於朝廷，達於倫物者，具載史宬，無煩記錄。……藩所錄者，或處下位，或伏田間，恐歷年久遠，姓氏就湮，故特表而出之。<sup>2</sup>

此一原則或許出於自己的切身之痛，無論是自己，或是他的先師，及他所撰記大部分學者，都是一生無功名、老死草澤，以經學為志業，甘心隱沒窮困，堅持而無悔，然而後人又豈可不留意而表彰之，闡幽發微，志存儒學於一線，又豈非儒者之志業所在，江藩用心，固有其令人佩服之處。

至於江藩建構系譜的觀念中，最受到關切的應是二書中——儒者的人文精神及學術思想之脈絡。在人文精神方面，江藩有意突顯出清儒謹守儒門分際的儒士形象，對清儒人物學行的各色樣貌，多所著墨，特別留意人倫之間，符合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規範。在「修身」、「齊家」方面，著重在自身品德，包

<sup>1</sup>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2月），卷一，頁4。

<sup>2</sup>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2月），卷上，頁2。

含忠、孝、節、義、信、仁、愛等，儒門一脈相傳之要求，清儒以此為立身處世之大節，可謂善繼儒門之精神。其次，彰顯清儒治學的用心，江藩突顯出經學家之為學成就，並非一蹴可幾，無論其天賦高低，治學皆須按部就班，力學不倦，許多清儒為學不倦之實例，都在在表述學者為學術奉獻之例證。尤其學者間的交往互動，彼此共同結社，交相唱和，不因彼此學派觀點互異，而互不交涉。更由於清代學術環境受到西學東漸，更能將西學的方法與中國的學術相結合，皆可見清代學術環境在分別漢、宋之餘，其實是兼容並蓄，包容不同學術路線以及外來文化的情形。

而在「治國」、「平天下」之理念基礎上，江藩指出清儒為實踐其政治理念，描摹出清儒表彰氣節，不願同流合汙，以及抵禦外侮死守家園，終獲得人心所歸之情事，此乃儒者為學之最終實踐，即是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之理想目標。從本文研究中，清儒形象可歸結幾個要點：首先，反清復明之士，謹守節操，絕不受清廷的威脅利誘。也有學者拒絕與政事有所交涉，而不願為官，然皆一稟其學，恪守其位，為家國、鄉里留下典型。其次，在混亂不明的局勢下，清儒有三種作為：一是「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；二是任官不改其志，不願同流合汙；三是堅守崗位為民造福。清儒以「仁民愛物」作為施政的具體要務，因此多能深受人民愛戴，其為家國之貢獻無庸置疑，而江藩所彰顯無疑指出儒學固然有旨趣之異，但也有終極核心之同，學問多方，但立身行道，無有不同。

另外，在江藩筆下，特別關注之人物行蹟，可歸納出以下幾端，條列如下：

一、侍奉至親之形象：清儒事親至孝，晨昏定省，事必躬親，不惜辭官歸養父母，遇親重疾，不僅隨侍在側，甚至憂勞成疾。親歿，宛如身判死刑，哀痛欲絕，竟也有憂傷過度，而一命嗚呼者。亦有為父報冤死之仇，與朝廷閹黨立下不共戴天之仇，終報父仇，江藩有意彰顯清儒謹守孔門恪遵孝道之形象。

二、學習情狀：清儒有天賦異秉者，聰穎靈敏，博學強記，讀書一目十行，能精通經史古籍，被喻為神童；有篤志向學者，手不釋卷、誦讀不已，即使遭受病痛、環境阻撓，仍勤學不廢，如此堅毅卓絕，故清儒研經考史，當作自身志業，以儒學傳承為己任，讀書不輟，所以才能成就斐然。

三、交遊情形：清儒交往互動頻繁，以品德互勉，以情義相交，時相書札往來，彼此討論切磋，甚至理念相合者共同結社，交相唱和，蔚為一股風氣，使學問更能相得益彰。另外，漢、宋學家雖彼此學派觀點互異，為捍衛自身立場而疾言厲色、有所爭辯，然在其他學術場合中，是可以共同營造和諧的學術

氛圍。清代學人間，其交往相處，更可窺知儒者學問交流之情形，無論是學術傳承或是彼此交相唱和，皆開啓清代學術交流的平台。

四、教化鄉里：清儒言動有則，潔身自持，雖盛暑，必肅衣冠，冬不爐，夏不扇，以聖人自勉，行道由己，方能以此喻人，因此以德服鄉里，鄉里之中津津樂道，皆是儒者立身處世、移風化俗之例，江藩特別彰顯清儒符合孔門德化鄉里實踐情形，更可見儒者雖未建立事功，亦可以立下風範，教化一方。

五、為政之道：清儒對家國的貢獻不勝枚舉，眼見國家陷入危急之際，揭竿而起，為民族國家而奮鬥，不惜犧牲生命，也要奮力一戰。見鄉民身陷水深火熱之中，更有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」之胸懷，共同抵禦盜賊，救助飢荒，俾使人民安身立命。清儒之義行，當不辱儒家「仁民愛物」的經世思想。清儒以實行「仁政」為其最高理想，崇尚氣節，操守廉節，深受人民愛戴，像是惠士奇、馬驢等人，百姓感念其恩德，紛紛為其立祠，其對於家國之貢獻是無庸置疑的。遵行儒家政治道德以行之，是為家國、人民之福，而江藩所彰顯的，無疑指出學問多方，但立身行道，卻無有不同，儒學之用於國，於此展現。

另外，江藩關切學術思想方面，則是特別留意傳承脈絡：

一、在清儒的學術理念方面：江藩特意彰顯漢學家之學術成就，其中包含：漢學家對研究學問之執著，治學態度之嚴謹踏實，無一事無出處，無一事無來歷，尤其對中國二千年來的文獻典籍，進行大規模的整理，使豐富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，更為後人研讀提供莫大之方便，貢獻至偉。其次，清儒之學術成就多方，像是史學、輿地、天文歷算等領域，或承繼前人成果，為校正其訛誤，皆有獨到創見。故清儒有極高之學術成就，無論在經學、史學，抑或是詩、詞、文章、律呂等，皆學有專精。清儒治學方法上，我們考察出「漢學」與「宋學」之差異：第一，「漢學」治學著重於經典辨證、考據、博覽；而「宋學」著重於經典的詮釋、省察、實踐。第二，漢儒以「毛、何、鄭」為正宗，堅守一家之言；宋儒以「周、程、張、邵、朱、陸、薛、王、羅、顧十一子」為正宗，以「主敬」、「良知」為其宗旨，然各有所宗，卻也彼此相互影響。

二、清儒的學術承繼方面：清儒少承家訓，受家族長輩調教，家學一脈相傳，清儒之師法、家法，更出於家學，甚至成為學術望族。對清儒而言，追隨大儒問學，是莫大榮幸，受業為弟子，恪守師法，更是以之為榮，以江藩所守惠氏之學，即可為證，而《漢學師承記》之作，更是為表彰師門而作。另一特殊現象是清儒

交友頻繁，彼此仰慕才學，藉由切磋問難交流學術，甚至影響彼此。故清代儒學能一脈相傳，無論是縱向傳承——家學、師學；或是橫向聯系——同儕交往問學，皆能使清代儒學傳衍不斷，此皆為江藩所特意彰顯之處。

三、清儒理念著作的延續方面：清儒學術深具傳承用意，前人未竟之業，後學踵繼其志，可見清儒學術傳承之特質；再者為先師遺作，補其缺憾，使前人著作更形完備，也在清儒慨然立志中續作完成，此皆有補於前人，有功於後世之學術成就。另外，清儒延續理念，將其未完成之遺作，囑託予子孫為其完成遺願，或者友人蒐集刊行以昭世人，皆可見學者相互敬重，惺惺相惜的情狀。是故清代儒者之著書立言，非僅立志傳承前人理念，更期以傳遞自身所學，清代儒者在著述立言方面，實有勝於前代之堅持，江藩於此著墨，其意深矣。

由此可見江藩於《漢學師承記》與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中，梳理清儒人物德行、事功、學術成就以及各自師承、交遊、家傳之關係，呈現豐富之學術樣態。每論及一位儒者，必交代其學術淵源，或為家學，或為師學，或為交遊對象，以作為學術傳承之系聯。在述及人物之學行事蹟方面，或為家世背景，或為仕宦之途，用意在於形塑其學術之影響。江藩刻意留意清儒之歷史使命，或以學行表之，或以著述表之，然而為其確立歷史定位上，則無可疑。

在學術思想之脈絡上，江藩關切的論題在儒者的治學理念，以《漢學師承記》與《宋學淵源記》書中論及之處，或為家學淵源，或為承繼師學，或為交相問難，在儒者的經學觀點上，或博通經史，或精於小學，或好金石、輿地、詩文……等，由於學術成就不同，治經方式自有差異。但在學術地位之認同點上，堅守捍衛各自學術之立場，其呈現之多元，正顯現清儒學術豐富之樣態與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。

於此我們可以反思並檢討，江藩的《漢學師承記》與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一出，對當時時代的影響，尤以《漢學師承記》一問世，招來宋學家的反擊，如方東樹的《漢學商兌》，甚至友人之間也未必全然認同，畢竟《漢學師承記》與《宋學淵源記》二書，學者的編排及選入，充斥著江藩個人的主觀意識，這便是其書之侷限處，亦是本文在探究的基礎上，「漢學」與「宋學」學術材料及立場偏頗之處。

只是筆者學力所限，對於書中傳主人物之生平、學術成就、理念著作等資料之考據，尚未全面詳加考覈。再者清儒學術複雜深入，也不是筆者所能妄加評論，只是如此篤實深厚之學術精神，自必有其相應之學術使命與歷史情懷。本文從義

理面切入，乃期許在學術史宏觀角度，關注清代學術傳承脈絡，了解清儒之歷史定位，彰顯清代學術之價值。

清代學術史之論題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，學界對於清代漢、宋學問題，多著墨於漢學與宋學間之利弊得失，然而漢、宋學術彼此交流互動的情形，卻少有關注，其實江藩分撰二書已有調合之意，所幸江藩本人已開始受到學術界關注，考據其生平、著作、交遊之情狀，其中值得觀察的是，從江藩本身出發，探討清代學派形成之過程與交流情形。然本文觀照清代漢、宋學術的同時，了解江藩以學術史觀點，有系統地建立起清代儒學系譜，完成清代學術的歷史定位，展現出清代儒學學術更為全面之具體脈絡，斯為莫大之貢獻，於此一則可以補充歷來研究清代學術偏重「漢宋之爭」的不足；一則彰顯清代漢學與宋學學術特質。

總之，以學術史角度了解清代儒學之傳承，更可見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與《宋學淵源記》之貢獻，從二書中，可以一窺江藩本人深具之歷史意識，建立清代學術系譜的成就。筆者以觀察者的角度，梳理清儒的人文精神及學術思想的不同面向，了解漢學領域與宋學領域二者表現之異同，歸結出清代儒學傳承之完整體系脈絡，只是面對如此龐大之史料，如此豐富之學術論著，各種不同領域的專門之學，筆者實乃惶恐不安，深知不足，相對於清儒一生以之艱苦成學，皓首窮經之氣魄與努力，卻又深感其用心所在，故不揣冒昧，率爾操觚，尚祈學界前輩有以諒之，並期許日後能深中幽微，彰顯清儒之學術成就。